

第3卷第3期, 2010年8月

(本期译自 Number 60, Summer 2010,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3, No. 3, August, 2010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国际问题

变革: 为了创新与经济发展.....85

高校教师如何看待治理与管理.....87

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对质量的追求.....90

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和分化.....92

中国的后义务教育与培训.....94

北京大学的人事改革.....96

中国转型期中的理工科大学.....98

英国高等教育

精英大学的全纳性: 以牛津大学为例.....100

英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102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印度对外国高校的门户开放: 远远不够.....104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107

蒙古的挑战: 高等教育的亚洲化.....110

庆祝洪堡大学建校 200 年周年.....112

新书简介.....114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副主编：王 琪
编辑：吴 燕

刊号：沪（K）第 0621 号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7986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jihe/index.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ociate Editor: Qi Wang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7986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jihe/index.htm>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变革：为了创新与经济发展

Sachi Hatakenaka

高等教育政策和管理领域的独立研究者、顾问

电子邮箱: sachi@alum.mit.edu

为了在创新与经济发展中发挥合适的作用，大学正在进行大量的组织变革。世界上许多大学都采取了相似的做法，就好像出现了一个所有大学都要遵循的标准清单。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清单是否有用。

政策、流程和激励措施

在很多国家里，制定合适的学校政策、流程和激励措施是鼓励教师开展新活动（如技术转让）的第一步。很多高校对教师从事校外活动制定了明确的制度，包括教师可以在校外工作的时间以及对相关工作的限制。许多英国大学初期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规定教师每周可以有一天用于咨询和校外活动。在日本，人们认为解决利益冲突的政策是关键。有关外部合同的线性流程也非常重要，对教师及其所在单位可以得到的经费和其他奖励做出规定。从香港科技大学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和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越来越多的大学正在改变学术绩效评价政策，以便认可知识转让的贡献。

专门的专业支持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其研究型大学现在的一种标准做法是建立技术转让办公室，负责处理专利、许可、合同研究和咨询等相关事务。即使在这种机构出现最早美国，工作人员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其中一半的人都是处理非许可类活动。为了加强教师与工业界或商业发展的联系，对技术转让活动

的支撑范围已经扩展到了高技术支持和工业联络方面。但是，并非所有这些工作人员都具有必备的知识，能够有效的工作。从事技术转让工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非常关键的是那种曾经从事过新技术发展工作、通晓科学知识的专业人员，但这样的人才不容易找到。

大部分开设本科期间带薪实习专业（coop program）或学生科研计划等特殊教育项目的大学，都会配备一些教师和专业人士专门负责这些项目。从亚洲到非洲，越来越多的大学建立了创业中心，为学生提供必需的课程和经历。但是，能够真正成为学生和教师与当地企业家建立联系的中心并不多。

对于高校职能中服务文化和社区的活动，如果这种活动按比例增加的话，那么专门的专业支持服务很有用。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起初建立在一个系里的社区服务活动支持中心随后成了学校层面的管理机构，给全校提供支持。很多大学里出现的另一个重要事项是校友工作，通常是为了筹募资金。但是，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让校友从事更宽泛的关系建立活动，如招生、校企合作等活动的并不普遍。

文化问题

改变人们的观念通常需要的不仅仅是规则和政策的修改。树立能够积极支持、指导他人的榜样，是改变文化的有效途径。比如

瑞典的查尔姆斯理工科大学，就聘用了一位积极从事工业界活动的教师作为典范，并为年轻的教师提供支持。很多大学纷纷效仿，创设了新类型的“教师”，如兼职教授、实践型教授或入驻企业家（entrepreneurs in residence）。

科技园

从1951年第一个建立的斯坦福工业园开始，科技园的数量不断增加，首先是在美国和欧洲，随口发展到了全球。在美国和欧洲，科技园往往与大学具有密切的联系，但在亚洲，许多科技园与大学都没有正式的联系。在中国，作为国家建立技术特区政策的一项措施，科技园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迄今为止，中国共有53个国家科技园、近200个地方科技园、63个大学科技园。

现在，人们认为大学应该在这些科技园里发挥更加互动得多的作用。只在园区招募企业和其他研发组织的做法已不够，现在有很多园区都更关注孵化新的高科技公司。另一种普遍的做法是园区提供更多的风险投资、管理支持和商业网络。时至今日，尽管有更多的风险投资公司都在全球运作，但很少有公司愿意或者有能力资助刚刚建立的大学衍生企业。专门从事与大学直接相关的早期风险投资和管理支持的项目正在增加，通常由政府提供资金。但是，由于难以找到真正需要的专家，这些项目大多没有成功。不过以色列和台湾的做法比较成功，因为它们在最开始就与硅谷建立了直接联系，还努力为本土的风险投资企业培养人才。

跨学科工作的内部机制

很多大学都在开展解决现实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与教学，但是建立跨学科工作的内部

机制并非易事。美国大学在跨学科研究中心方面历史悠久。从20世纪90年代起，更大型的开拓性跨学科研究计划不断出现。麻省理工学院的能源研究计划（Energy Initiative）就是一个旨在解决世界能源危机的项目。它不是一个研究院，而是包括研究和教育、校园能源管理等在内的一系列项目。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计划现在将自动设立附属的企业合作项目，从而确保有兴趣的企业伙伴可以参与并做出贡献。

高校的领导

高校与企业的大规模合作正在不断增加，不仅在美国和欧洲，在亚洲（尤其是新加坡和中国）也是如此。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学校有能力确定一个让多个企业伙伴和不同学术团体联合围绕其工作的核心主题。这种具有风险的事情，需要在自上而下的机会创造和自下而上的思想产出之间建立很好的平衡。这样一种能力的关键在于学校有两种领导者。第一，为了领导这样的计划，需要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尊敬，而且还得到学者之外的利益相关者的信任。第二，校长、副校长、院长等学校领导也非常重要，能够把规章制度和流程在全校推行、动员学校更多的力量参与、把与企业间的对话从狭隘的委托研究提升到长远的研究合作。

高校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解决那些人们对学校与企业关系的争议，比如人们对医药企业在美国医学院中的作用一直以来都有争议，并且还将不断出现，高校将不得不时常审视自己的相关规则。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只有经过严格的试验，以及经常存在争议的做法，大学才能在经济发展和创新中，形成合适的组织策略和架构。

高校教师如何看待治理与管理

William K. Cummings William Locke Donald Fisher

William K. Cummings: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教育领域教授;

电子邮箱: wkcum@gwu.edu

William Locke: 英国开放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信息中心副主任;

电子邮箱: W.D.Locke@open.ac.uk

Donald Fisher: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高等教育与培训政策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donald.fisher@ubc.ca

高校教师们现在喜欢追忆在高等教育决策方面有着合理劳动分工的那个年代,即教师负责学术事务、学校理事和管理者负责财务问题和外部关系。“共同治理(shared governance)”这种高等教育决策模式曾经非常的流行,因为协商式管理提高了教师在学术领域和学校中的表现与忠诚度。但是高等教育目前的私有化、市场化和更加问责化的趋势,可能会削弱共同治理“黄金时代”的契约。

为了评价高校教师对高等教育治理和管理现状的看法,“处在变化期的学术职业(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项目在2007年对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芬兰、德国、香港、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挪威、葡萄牙、南非、英国和美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卡内基教学促进会资助的“全球学术职业调查”,其中8个国家的趋势数据可以追溯到1992年。

共同治理

在被调查的18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高校教师认为自己有权单独或通过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如新教师遴选、教师晋升和

终身教职确定、批准新的教育项目)上做决定。高层的管理者(尤其是院长和系主任)往往是决定预算优先事项和遴选核心行政人员。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的教师认为自己较有权力,英国、芬兰和美国教师的略低,而德国和大多数新兴国家的教师则认为自己权力较少。其中,中国、马来西亚和巴西的教师认为自己的权力最少。在预算和行政人员决策方面,唯一反常的是墨西哥。和其他17个国家的教师相比,墨西哥的教师认为政府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在该方面的权力较大。

衡量共同治理的一个标准是教师认为自己在学校中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和预期一致,所有国家的大部分教师都认为自己在学系层面较有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65%)、加拿大(60%)、德国(57%)、巴西(63%)、墨西哥(61%)、韩国(58%)和南非(56%)。但是,当把个人影响力从学系层面扩展到学院或整个学校层面时,教师认为自己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就只有美国、巴西、韩国和墨西哥等4个了。英国、芬兰、挪威和香港的教师认为自己在这三个管理层面上的个人影响力都较低。

学校设施

总体来讲,共同决策和协商程度越高,高校教师越容易对本校设施的质量和支撑程序的有效性给予积极评价。在新兴国家中,墨西哥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其高校的共同决策度较高,教师对学校设施质量的评价也高。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中,香港高校由于相对多的自上而下决策而突显。但是,香港高校教师对设施的质量和支撑程序的有效性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对学校的忠诚度

在多数成熟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在被要求评价自己对所在学校的忠诚度时,不到2/3的教师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答。在英国,只有不到40%的教师表达了这种观点。这和少数新兴国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和墨西哥,有80%~90%的教师表示出对学校的忠诚。

1992年后的变化

对于那8个有历史数据的国家,2007年的大部分调查结果可以与1992年的结果进行比较(取样步骤相似、问题基本一样)。尽管高校教师最近抱怨自己无权,但与1992年的情况对比显示,教师如今在决策制定上的影响力和1992年一样。因此,如果教师失去了权力,那么这个过程应该在1992年调查之前就开始了。整个的权力分布也发生了变化,院长和系主任在决策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而更高层的管理团体(如学校主要运营者、信任理事会和政府部门)让出了一些权力。

权力分布的变化(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比较温和)和设施质量变化的关系不大。1992年,比较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拥有最好的设施,2007年的结果亦是如此。变化主要出现

在几个新兴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巴西、墨西哥、香港和韩国。为了赶上更发达教育系统的设施质量,它们提高了设施的质量。事实上,2007年香港的教师认为他们的设施最好,而1992年评价相对较低。虽然只有13个方面可以从时间角度进行对比,从1992年到2007年,对教学的管理支撑质量有所提高(虽然没有对研究的支撑质量提高那么明显)。

忠诚度的下降

1992~2007年间,最惊人的变化可能是教师对学校忠诚度的下降,如上文所示。1992年,大多数参与调查国家的教师都表示出对自己所在学科、学系和学校的高度忠诚。2007年,所有国家的教师仍然表示出对自己学科的高度忠诚。但是,在有时序一截面数据(panel data)的8个国家中,其中有6个国家的教师对自己所在学系的忠诚度略有下降,对所在学校的忠诚度急剧下降。在这6个国家中,90%的教师表示出对自己学科的高度忠诚,而不到60%的教师表示出对学校的高度忠诚。对学校忠诚度低与教师的以下看法有关:学校普遍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设施不足、支撑服务过于官僚化。巴西和墨西哥等新兴国家的情况有所例外,其高校教师在1992年和2007年的学校忠诚度都很高。

教师对学校忠诚度的下降已产生了一些影响。对学校忠诚度低的教师更可能喜欢研究而非教学,更可能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研究而非教学,更不可能参与学校的服务或管理工作。

启示

在比较发达社会的高等教育系统里,相当一小部分因决策过程和工作环境不足以支

撑工作而意志消沉的教师，正在减少对教学工作 and 日常管理的投入。因此，这些系统可能正在丧失宝贵的学术能量。

相比之下，在几个新兴国家里，共同治理最多也就是虚弱无力地实行。但是，强有力的管理者能够实现高质量的设施配备和有

效的支持服务。此外，这些更加独裁的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教师认为他们的领导是明智的决策者，不仅明确了学校的使命，也进行了适当的管理。

中国高等教育对质量的追求

李奇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qli88@hotmail.com

由于1999年开始的大规模本科扩招,中国在2002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由于公众对扩招后高等教育质量的怀疑不断增加,教育部于2003年开始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改革工程。该工程自2007年起升级,并得到教育部和财政部的共同资助。

质量工程

质量工程关注如何通过改革和资源共享,提高本科教学的质量。质量工程包括六个方面的建设内容: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认证;课程、教材建设与资源共享;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教学团队与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评估与教学状态基本数据公布;对口支援西部地区的高校。

在2006~2010年的第11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政府计划对上述项目投资25亿元人民币(约折合366,241,338美元)。此外,中央和省级政府也给予那些对教学改革做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各种荣誉和奖励。尽管如此,由于下文所讨论的因素,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做法是否会取得预期的效果。

问题和挑战

仍未解决的利益冲突。质量工程中那些拨款、奖励和荣誉至少传达出两个振奋人心的信息。首先,该工程再一次让教学成为一种可以研究和奖励的学术研究,这标志着教学在高校价值体系中地位的提高。其次,奖励体制本身被用作一种改变的途径,因此可

以鼓励教师参与改革活动。

虽然这个工程的本意是积极的,但目前尚不确定这些信息能否被传递给普通的教师,因为没有政策来规范整个实施过程。由于一些申请者,尤其是学术和/行政部门的领导者,通常有资格评审其他申请者的资格,他们事实上的裁判角色可能会使其将自己、朋友或同事的利益置于其他人之前。诸如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因此,利益冲突几乎到处都能感觉到。

胜出者拿走一切。在经费和奖励的竞争中,获胜者通常是各级学术和/或行政部门的领导。2007~2009年被授予国家级教学团队队长荣誉的300人中,83%的人都有这种背景。2008年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师奖的97人中,79%有这种背景。有趣的是,即使是那些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获奖者,其中有些是院士,另一些则是前院长、前系主任或者其学校或政府机构的学术或顾问委员会领导。

一些申请者不当地利用了自己多重角色的优势,不仅证明了他们对学术和行政事务的控制,也获得了他们不应得的特权,例如得到更好的奖励、部分甚至完全免去教师或行政人员所需承担的最低工作量。这种现状不仅引起了人们对获胜者能否保证在单位里公平竞争的怀疑,也引起了人们批评奖励本身的可信度,挫伤了普通教师的士气。

说辞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事实上,质量工程,尤其是目前的教学改革,从学术界得

到了大量的言论支持。但是，高校是否一直在努力调动、支持教师参与改革，目前尚不清楚。在很多高校，获得拨款和奖励似乎就等于在教学改革取得成就。极少提供证据来说明这些改革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如果没有得到奖励或荣誉，那么教师的教学投入就基本上没有认可和奖励。虽然对于教学的重要性有很多说辞，但很少有高校设立支持或促进教学研究的办公室。简而言之，在学校、专业和课堂层面上，没有有重大价值的教学改革。

结束语

质量工程的实施，主要是中央政府为了应对公众越来越多地质疑 1999 年扩招后的本科教育质量。虽然该工程得到了学术界大量的言论支持，但是由于没有事实证据，我

们很难确定或者证实它提高了本科教学的质量。

因此，高校迫切需要明确并遵守自己的价值观，以便在尽可能减少本科教学改革中削弱士气因素的同时，营造和维持一种信任的氛围。此外，学校必须给教师提供支持和奖励，促进他们在学校、专业和课堂层面上进行教学改革和实验，从而积极争取教师的专业投入。

但是，由于目前高等教育中的官僚式领导，可能难以在一夜之间鼓起教师的士气或获得其专业投入。因此，政府和高校都必须开始解决一些有关权力、政治和学术内部尊卑次序的难题，从而在追求高质量本科教育的过程中，重视和培养非英雄式领导。

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和分化

刘继安 王晓燕

刘继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博士生；电子邮箱：jian99.liu@utoronto.ca

王晓燕：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员；电子邮箱：xiaoyanzi.wang@utoronto.ca

过去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高等教育扩招，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猛增到2008年的23.3%。2008年末，高校在校生数为2,907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虽然有很多研究聚焦于这次大规模的扩招，但很少有实证研究审视高等教育系统正在经历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改变。本文从公立和民办高等教育、各科学层面，描述了国家和地方高校中本科和专科专业的变化。这些趋势将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分化有所启示。

中国的高等教育由正规学历教育（普通和成人高校）和柔性教育模式（网络学习和学历考试助学教育）组成。本研究关注普通高等教育，因为它的扩招速度远远超过成人高等教育和柔性高等教育，并且学生数量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70%（2008年）。

谁是扩招机会的提供者？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扩招大多出现在地方性高校，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全国性高校扩招规模较小。地方性高校的在校生数量1998年是225.8万，2008年增加到1457.8万。相比之下，全国性高校的在校生数量仅从1998年的154.1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170.5万。这种趋势出现的原因，可能是部分在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管辖权转移。当时受中央政府部门管辖的367所高校，有250所的管辖权被转移到所在省。

高等教育系统原本相对“扁平”的结构，在扩招后变得更垂直分化。全国性高校中的大部分两年制专业被取消，其在校生数从1998年的206,858人，下降至2008年的64,995人。相反，地方性高校的短期课程繁荣了起来。两年制专科专业的在校生数从997,854人增加到7,404,422人，2008年占地方性公立高校在校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与此同时，全国性大学的声望和水平因为“211工程”和“985工程”这两个专项计划的实施而进一步得到加强。“211工程”从1993年起，遴选了100所大学优先进行投资建设。从1998年起，“985工程”开始实施，为43所一流大学提供更多的资金，希望将其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全国性和地方性高校的差距因此明显加大。两种高校生均经费的差距从1998年的3,708元，扩大到2006年的8,196元。

民办高等教育的作用

在不允许民办高等教育存在的三十年后，第一所民办高校（对私立高校的委婉说法）成立了。但是，民办高等教育也是在快速扩招政策出台后才开始繁荣发展的。1997年，提供正规学历教育的民办高校有20所（约占普通高校的0.9%），在校生数为1.4万人（约占总数的0.4%）。在2003年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指导下，提供正规学历教育的民办高校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638所，约

占全国总数的 28.2%。

二级独立学院的发展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独立学院隶属于公立高校，但是得到的国家投资很少，完全依靠学生的学费。独立学院所招收学生的学术水平低于所属的公立高校，但是人们希望独立学院的上级公立高校能确保其基本的教学质量。独立学院引起了人们对文凭差异、质量和公平等问题的热烈讨论。2008年，全国有 322 所独立学院，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的在校生总数达 392.7 万，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 19.4%。

不再是精英教育？

扩招之后，虽然四年制本科专业教育的学生数仍占高等教育学生总规模的一半以上，但是两年制专科教育的发展更为迅速。1998年，普通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总数是 340.9 万，其中 223.5 万（65.6%）接受四年制本科教育，117.4 万接受两年制专科教育。2008年，接受四年制本科教育的学生数是 1142.2 万（1998年的 5.1 倍），占总数的 54.6%；两年制专科教育的学生数是 916.8 万（1998年的 7.8 倍）。

哪个学科专业的扩招最快？

虽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所有专业都扩大了招生规模，但是不同学科专业在扩招速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工学专业的学生数量依然最多，2008年占学生总数的 40%，而就读于理学和农学专业的学生数占学生总数的比重几乎缩减了一半。随着工商管理类和行政管理类专业的快速扩招，管理学的学生

规模大大提高，所占比重从 1998 年的 14.9% 增加到 2008 年的 24.7%。教育学和文学专业的比重略有增长，而法学和社会科学的比重略有下降。

因此，并非所有学科专业四年制本科教育的学生数都高于两年制专科教育的学生数。例如 2008 年，教育学、工学和管理学三大学科的专科生数，就超过了本科生数。农学和医学专科生的比重也明显高于 1998 年的情况。但是与此同时，理学本科专业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加强，2008 年的在校生数是同类两年制专科生数的 236.1 倍。

结束语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和重构，加剧了地方分权、分化和私有化。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演变成一个分层次、多元化的系统：全国性大学仍然处在最上层，志在成为世界级一流大学，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声望；地方性公立高校仍处中间，是高等教育的主要提供者，为地方发展做贡献；民办高校大都处在底层，重点进行职业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高校的多元程度被大大提高，主要是通过四年制本科教育和两年制专科教育有差异的扩招，特别是不同学科专业的差异化发展。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可用于扩招的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在分化的过程中，课程结构也得到多样化，更加符合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

中国的后义务教育与培训

王琪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

电子邮箱: qimwang@sjtu.edu.cn

最近有关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个人的学习动力与政府进一步发展后义务教育和认证学习培训项目的政策取向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体现了中国“文凭主义”的文化和历史力量,可能阻碍终生学习的推动和发展。

政府的观点

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就在政府政策中,大力提倡建设“学习型社会”,例如2004年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6年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和2007年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一五”规划纲要》。其他一些推动终生学习文化的政策则由直接的教育举措和规则推进,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这些政策举措体现了国家欲通过发展科学、推动教育和培养技能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复兴。

由于这些政策,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已有的大学教育和学位之外,涌现了大量新的职业资格认证教育和培训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会计、法律、制造业、环境科学,几乎涉及所有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作为“学习型社会”计划的一部分,这些项目主要由相关的工业部门和各级政府计划并实施,旨在满足社会和经济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例如,1993年起,上海市政府开始实施上海市紧缺人才

培训工程,旨在培养九个领域的劳动力,以满足上海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培训项目包括60多种学科和证书。该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里有430多万人次参加该项目的培训和考核。

在校大学生的观点

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全日制大学学习不能让他们拥有就业市场所需的技能。因此在大学学习之余,他们积极参与这些后义务教育培训项目。学习机会的不断多样化,让大学生可以培养和发展就业市场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学生深信只有在大学学位之外得到各种额外的证书,才能形成一种就业生涯保障。现阶段高校的毕业生越来越多,就业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然而,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又低于大学毕业生的增长速度。大学学位不再像社会经济改革之前那样,是就业的保障;它们现在只是进入就业市场的敲门砖。拥有额外的资格证书,才能在文凭贬值的大环境下保护大学毕业生、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这种文凭至上的心理,刺激并鼓励学生参与后义务教育培训项目,从而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例如,前文所述的上海市紧缺人才培养工程最初是针对有专业经历的专业岗位人员所设计的项目;然而,现在的参与者大多都是大学生,他们把该项目看作是一种教育、求职的投资。

但是实际上，一个证书并不能准确反映其持有者的技能和知识的掌握情况。在中国尤其是这样，人们通常认为学习的内容偏理论、与现实社会无关；学习方法却又强调死记硬背。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培训项目是获得各种证书文凭的形式，因为证书文凭只是可以交换工作机会的有限纸币。

但是政府创建这些教育培训项目的本意是为了给希望“提高自身能力”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意味着学习是一种道德义务（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观点）。而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以这种道德目标建立起来的项目，却变成了一种证书文凭的市场经济交换，而非真正的知识和技能教授。

两种观点的不协调

政府发展终生学习的政策取向和个人的学习需要并不关联。为了维持国家发展的动力，政府针对技能需求和短缺情况，创建了各种不同的高等教育培训项目。从政府的观点来看，这些政策是直接出于对人力资本发展的考虑。

然而，个人的学习需求表明，“文凭主义”的强势文化力量影响了人们的学习方式。这

也表现在：学生怀疑高等教育体制的质量、教育和资格证书之间的作用；他们发现自己必须（或被迫）学习，根据目前就业市场的需求，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从而提高自己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真正”的终生学习的概念，即学习是为了促进个人的内涵发展。

因此，在高等教育和后义务教育培训进一步衍变成一种功利性的技能培训的前提下，“文凭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而，儒家文化对于“学习”的定义从某种程度上又能有力地推进中国建成学习型社会。在中国，人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理论的影响，都在积极学习，不分年龄、性别或社会背景。中国的这种情况可以和西方的工业社会形成对比，在西方很多社会现象深受社会阶级、阶层等结构因素的影响。

从这种意义上说，政府需要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要，重新考虑职业资格认证教育的策略（包括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确保人力资源的成功发展，并反思“文凭主义”所产生的文化历史误区。

北京大学的人事改革

杨锐

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电子邮箱: yangrui@hkucc.hku.hk

为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北京大学计划彻底改革其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这项改革计划远远超出了人事事务的范围,引起了学校和全国的强烈反响。这场改革被普遍称作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风向标,生动刻画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大学新策略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有助于确定今后的方向和动态。

改革的原因

造成北京大学进行人事改革的原因有若干。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增加,市场意识已经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萌芽。中国公众对大学的关注越来越多,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期待也在增加。同时,中国政府决心在十年内战略性地促进一批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并为其投入大量资金。北京大学想要通过人事改革,拥有世界一流的教学和研究力量,从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另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经费问题。1999~2001年间,政府为了支持北京大学的发展,额外资助其18亿元。这笔经费被用于大幅提高每位教师的工资。虽然普通教师也许不会觉得学校拿国家这一大笔钱有什么不适合,但是学校的领导却感到这笔钱拿得烫手——如果今后还希望得到国家更多的经费支持,学校就必须展示出真正的成绩。因此当北京大学的高级职称岗位已被占满、但拿着高薪水的教师基本上没有一个愿意离开

时,学校推出了以鼓励竞争、促进人员流动为目的的人事改革。

改革方案

2003年5月12日,北京大学人事改革工作组的起草委员会通过了改革方案的初稿。初稿随后在全校公布、征求意见,引起了大量争论。在大学内部和社会的强烈批评和建议下,领导和实施小组6月公布了有明显修改和大量妥协的改革方案二稿,供大家讨论。二稿重新调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旨在稳定大学现有的师资力量。但是改革的初衷,即用市场机制改革教师的聘用和晋升、置换教师以实现重建师资队伍的多米诺效应,最后基本以失败告终。2004年4月,北京大学的人事改革终于开始实施。虽然学校认为自己遵循了改革设计最初的基本原则,但是最终的改革方案却温和很多,做出了很多妥协,让人们觉得改革开始时动力十足,最后却只是流于表面。

北京大学改革方案的实质是开放学术职位,其基本特征有以下六点:(1)教师实行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2)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3)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4)原则上不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师;(5)对教师实行分类管理,即教学科研人员 and 全职教学人员;(6)招聘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

正反方的争论

在初稿发布不久，其中建议的六大重要举措都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也得到了强有力的辩护。这个在很多西方大学很常见的改革计划却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主要是因为改革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人事制度的变化，而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只要成为大学教师，就算拿到了铁饭碗。

支持改革方案的大部分人都与北京大学关系不甚密切或完全没有关系，而持保留意见者则与学校有直接关系。最集中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校内或校友中的人文学者和一小部分社会学者。最尖锐的反对意见是：“改革北大，还是阉割北大？这是个中华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最“上纲上线”的反对意见是，指控现行改革方案违法！

改革方案得到了其他大学校长的强烈支持。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朱清时认为，北京大学的改革是一项创举，自己希望效仿。方案也得到了高等教育专家的广泛认可，包括厦门大学的潘懋元和北京科技大学的杨东平。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纪宝成指出，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他坚信首先需要改革的就是人事制度。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争论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是有关中国大学的理念的讨论。人们认为中国大学的根本使命必须明智地结合西方大学的传统和中国的精神、智力、文化和教育独立。中国大学改

革的方向应该是发展这样一种使命。争论的双方都同意上述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实际的优先性。

现实观察

与早期的广泛关注相比，近期对北京大学人事改革的讨论极少。事实上，在新中国庆祝六十华诞之际，随着许智宏校长的离任，北京大学的人事改革几乎完全失败。该方案在实施几年后，几乎带来没有任何变化。

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其他主要领域的改革一样，北京大学的人事改革也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主要体现了官员的愿望。改革由大学的最高领导层推进，由在主要英语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设计方案。不过北京大学的改革寻求软着陆，希望通过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获得各方赞同，在方案实施前充分征求各方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改革结果与很多预期目标相差很远，但仍然值得些许称赞。

北京大学的改革远远超出了人事范围和大学校园，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人们对改革方案的反应，体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难度，它是“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北京大学人事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体现了中国长期以来在主流的西方模式和发扬自身丰富文化教育传统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这一改革实验再一次说明了中国大学国际化的复杂性。

中国转型期中的理工科大学

许美德 查强

许美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系教授；

电子邮箱：ruth-hayhoe@sympatico.ca

查强：加拿大约克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电子邮箱：qzha@edu.yorku.ca

理工科高校历史悠久。法国是把第一个把工学作为高等教育学习专业的国家，1794年法国大革命结束不久就成立了巴黎高等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这个学院和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其他“大学校”的地位，明显高于传统大学。这与19世纪早期德国工业大学（Technische Hochschule）的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一些工业大学在该世纪后期取得了与大学平等的地位。前苏联比法国和德国走的更远，理工科大学在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系统扮演着主要角色，非常适合苏联的宏观社会经济计划体制，将各种工程专家分配到分工明确的专业和地理部门。

中国的理工科大学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采用了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后，工学学生的比重从15%增加到1960年的36.5%，理工科和专门工科大学获得了最高地位和声望。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被迫放弃原有的人文和基础理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突然被给予新高度的认可。中国的很多领导人都毕业于这类大学，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著名综合性大学通常是培养大学教授、基础学科的专家、作家和艺术家。

在建国初期，国家希望理工科大学聚焦应用学科领域，只保留能确保技术可靠的基

础学科和数学即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做法的问题逐渐突显。中国科学院史无前例地在1958年成立了自己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致力于进行最高水平的纯科学研究，以及基础科学与技术、教学与研究的融合。随后其他理工科大学也受此影响，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上述改革使得课程设置得以拓宽，再加上前所未有的与国内高科技企业合作的机会，让这些理工科大学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保持了领先地位。就在最近，富裕的沿海城市深圳，决定投资一百亿人民币建立南方科技大学，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不是在现有的深圳大学这一综合性大学上加大投资。

北京大学1998年百年校庆不久后实施的“985工程”，第一批选中了9所高校，其中6所有理工科背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只有3所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当其他大学加入“985工程”后，第一批建设的9所大学为了保持它们的特殊地位而结成了联盟，被戏称为“中国的常春藤盟校”。因此，在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努力参与全球知识经济竞争过程所进行的改革中，中国的理工科大学被置于了领军地位。

优势

在发展科学技术、服务国家竞争力方面，中国一流的理工科大学有着独特的优势。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宏伟的经济目标，在关键领域建立了很多国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大多建在一流理工科大学附近，国家鼓励这些大学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例如，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也是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的主任，中国光谷就紧临着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园。由19个国家部门支持的杨凌农业科技示范园，就坐落在西北农林大学旁边。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则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这些大学都不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但是为了周边的经济发展，政府选择将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建在这些大学附近，提供相当可观的研究经费、设备和机会。许多理工科大学还积极为一些中国的主要跨国企业提供咨询，并因此从民间得到很多资金。但这种趋势的问题在于，教师容易受到诱惑，关注这些相对容易的研究经费，而不是有挑战性的基础科学研究。

局限性

理工科大学最大的局限在于，它们在科学和工程领域之外的学科覆盖面有限。近年

来，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一批大学已经和附近的医科大学合并，以便为生物医学研究等提供良好的研究机会。但是，很少有大学能够恢复其哲学、文化传统，而像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在1951年转型为理工科大学之前一直以此闻名。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现在还要越来越多地发挥新的地缘政治作用、发展文化外交，理工科大学在有关全球治理或跨文化对话讨论中的作用弱于综合性大学。虽然一些理工科大学已经和外国机构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但它们主要是针对商业目的的汉语推广，而不是哲学交流或跨文化理解。

对于中国当代理工科大学的精神气质，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上海交通大学世界著名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它对全球大学的排名几乎完全采用科学研究和论文发表方面的指标，极少关注教学质量、教育声誉和校风。这也体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局限性，虽然这所大学在工科方面的辉煌历史可以追溯到1897年，并且最近刚刚与上海最好的一所医科大学合并，但在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方面仍然比较薄弱。

精英大学的全纳性：以牛津大学为例

Anna Zimdars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变迁学院研究员

电子邮箱: Anna.zimdars@manchester.ac.uk

环绕着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东京大学和法国“大学校”等精英大学的神话是：这些学校极难进入。并非所有希望入校的学生，都可以被录取。在各种国内和国际排名中都位居榜首的哈佛大学，招收的本科生数量不足申请者的1/10。英国古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招生数量约为申请者的1/4。

为了说明精英大学在本科生招生中面临的三大挑战，可以以牛津大学为例进行分析。这三大挑战分别涉及规范（哲学）、实证（社会研究）和政策层面：这些最富声望的精英大学应该招收哪些学生？实际招收的是哪些学生？如果要改变招收模式，我们可以怎么做？虽然不同国家对上述问题的具体答案可能不同，但这三个问题在任何国家都存在。

应该招收的学生

对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哪些人应该获得成功的观念，大学是顺应的。在英国的政治或媒体里，对社会阶层的讨论占主导地位。人们普遍的观念是，一个人出生在父母都是专业人士而非体力工作者家庭这一偶然性事件，不应该决定其人生的机遇。但是，让很多人和政策制定者失望的是，父母的职业仍然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更富裕的家长通常不选择公立中学，而是让孩子通过私立教育得到优势。在英国，私立中学的学生数量不到中学生总数的1/10，但是中学

会考得高分的学生、被最牛津和剑桥这样最好大学录取的学生，有1/2都来自私立中学。

虽然这样的情况可能只出现在英国，但是社会出身和教育成就之间存在一些相关性的事实，令人不足为奇。经合组织最近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表明，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中和了学校教育和阶层背景的影响。但英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英国政府成立了监管大学招收不同类型中学毕业生数据的部门，即公平入学办公室（Office for Fair Access）。该机构给各个大学设立招收公立和私立中学学生比例的目标，以便提高公立中学毕业生的大学入学机会，增强教育的公平性。

人们希望大学不要加剧基础教育的弊端，可能还应该对这些弊端进行谴责，从而给每个孩子的学术潜能发展提供完全公平的竞争环境。英国的大学招生关注的焦点是公立中学和社会阶层，而美国的大学招生非常关注种族问题。人们可能会期待每个国家具体的多元化情况（无论是种族还是社会阶层），应该影响到实际的大学招生。

实际招收的学生情况

政策并不一定总是能够实现全面平等，因此2002年牛津大学针对自己的招生遴选过程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发现学校是否兑现公平选择的承诺，即不论申请者的阶层背景、

来自私立还是公立中学，只根据其能力和潜能进行招生的原则。种族和性别在招生中的影响也被纳入研究范围，但是研究团体对其兴趣较小。

研究发现，申请牛津大学的个体情况有所倾斜：与中学毕业生总数相比，来自工人家庭和公立中学的学生比例较低。考虑到来自工人家庭和公立中学的学生占优秀毕业生总数的比例不高，那么两者间的差距就减少了。少数民族学生通常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比例过高，但是在牛津大学申请者中既不过高也过低。申请者的性别分布基本均衡。

对于申请成功者，研究根据申请者之前的考试成绩，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者在此发现，在成绩一样的情况下，牛津大学的招生人员偏好来自公立中学的申请者而非私立中学的申请者。这种偏好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大众所知，因为私立中学申请者的成绩通常略高于公立中学的申请者。对成绩相同、种族不同的申请者进行比较后，发现非白人处于劣势。

正在改变的大学招生

从牛津大学的这个研究中，政策制定者将会同时看到一些好的和坏的消息。好消息是改变大学招生模式的可能性。几十年前，人们认为牛津大学是一个特权的堡垒，但是内部和外部力量使学校出现了唯能力至上的变革，现在考试成绩是招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公平入学办公室设定了需要招收的公立中学毕业生比例后，对牛津大学的招生人员进行培训，要求他们提高被录取者中公立

中学申请者的比例，现已取得成功。在做出实际的招生决定时，对成绩一样的申请者，招生人员判定公立学校的申请者比私立学校的申请者更有潜质。这个趋势符合增加英国最富声望大学中公立中学毕业生数量的政策。

但是坏消息是，遭受社会不平等、没有同样公共影响力（public salience）的个体，可能将仍不被关注。牛津大学的招生人员既没有被培训也没有被监督，以确保招收申请者中成绩优秀的少数民族学生。牛津大学面对面的招生过程可能会容易造成一些自我复制的倾向。因此，占多数的白人招生人员可能会无意中根据自己的形象进行筛选。这种自我复制过程在心理学和招聘中的记载很多。

如果政策制定者力求增加英国一流大学里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他们可以通过提高招生人员的这种意识来开始这个进程。在美国，对种族问题的公共讨论，有助于国内一流大学中相对较高的少数民族招生比例。但是同时，这一特定政策的成功，可能会让其他不平等现象影响教育结果，比如就读的中学不同。

牛津大学的例子说明，大学对其所在的社会环境是顺应的。本科招生可以考虑政府和社会的愿望：精英大学的招生有可能更具全纳性。但是，在决定今后要向哪些群体进行政策倾斜时，可能要根据全民对值得拥有国家最精英大学教育的群体的共识。

英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

John Fielden

英国汉普郡小型管理咨询机构 CHEMS Consulting 主管

电子邮箱: johnfielden1@btinternet.com

英国大学联合会 (Universities UK) 最近的研究报告《英国私立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增长》，对英国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增加以及这些机构是否会威胁到公立高校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就像私立高等教育自身的复杂情况一样。私立高等教育教育提供者的情况多样，不可能对其一概而论，只能说它们的数量正在增加。

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的类型

首先，一些外国高校已经在英国建立分校。这些分校的确切数量尚不清楚，但很可能至少有 70 所美国大学的分校，主要从美国本土的校区招收学生，并为其提供教育。不过也有少数分校招收英国和欧盟的学生，如席勒国际大学 (Schille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和里士满美国国际大学 (Richmon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这类学校的数量正在增加，除了大量的美国高校，来自马来西亚、波兰、印度和伊朗等国家的高校最近也在英国建立分校。

其次，五大机构已经在英国取得了学位授予权，即白金汉大学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BPP 公司 (现在归美国的阿波罗集团所有)、法学院 (College of Law)、阿什里奇管理学院 (Ashridge Business School) 和英国金融服务学院金融学院 (ifs School of Finance)。这些高等教育提供者也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机构。其中只有 BPP 是营利性机构，

大部分主要给英国学生提供法律和金融类的研究生课程。在 5 所机构中建立时间最早、规模最小的白金汉大学，只有 1,000 名学生，其中一半以上是留学生。

第三，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是提供英国大学或专业团体所许可的高等教育的私立学院，主要都在伦敦。目前还不知道这种学院有多少，它们的学生有多少。一旦英国边防局现有的监管体制 (主要是签证控制和移民制度) 确定下来，就能知道一些统计数据了。英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 (私立高等教育的两个认证机构之一) 已经批准了 117 个英国和外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机构目前有 30,000 多名学生。此外，在另一所认证机构——国际学院认证机构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Colleges) 所认证的学院中，大约共有 50,000 名学生。这些学生多数是留学生，但是一些学院正在逐渐将培养项目扩展到英国和欧盟的学生市场。例如，一所私立学院可以提供两年制的理学荣誉学士学位教育，全部的学费是 8,400 欧元。接受这个项目的英国学生，有资格申请国家学生贷款。这个项目的学费总额与英国学生目前接受传统三年制学位培养项目所付的 9,700 欧元学费差不多。

最后一类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是那些与老牌公立大学有合约的公司，为大学提供英语教育、基础课程教育、一年级教育和研究生预科教育。目前有 5 家这样的公司，为 33

所大学服务。对那些大学来说,这种公司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们招收留学生(与大学自身的国际市场开拓保持一致),然后将其语言和学术水平提高到能够接受大学一年级或二年级教育的程度。学生通常被安顿在今后要入读的大学校园中为了特殊目的而建造的住所里,使用的教学大纲则是得到了他们今后要进入的学院认可,如果学生能通过这些学院的考试,那么他们就会转到那些学院学习。在这5家公司中,有3家是外资营利性公司。

近年来,私立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很多私立学院正在疯狂扩张,几乎全是招收的留学生。其中最大的伦敦商学院(London School of Commerce),约有5,500名学生。这所学院和其他几所私立学院一起,计划获得学位授予权。这些私立学院扩张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每年对留学生收取的学费远低于公立高校,大部分本科专业的学费是一年4,000~7,000欧元,一年制商业管理硕士专业的学费是5,000~10,000欧元。另一个原因(学校自己的说法)则是,学校为学生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支持和照顾,让学生非常满意。

对今后的启示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增加对公立高校是威胁,还是机会?为什么公立大学认可私立学院的项目?留学生只需付一半的费用就可以在私立学院得到与公立大学同样的资格,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在失去自己的市场份额,培养私立竞争者吗?这些竞争者不久将取得学位授予权并给国内市场带来挑战。如果国家提高目前对公立高校学费的限额(这很有可能),那么是否会大大促进私立高等教育的

发展呢?

公立高校称自己并没有因为这些问题而惊恐。几乎所有认可私立学院教育项目的高校都从中得到了相当的收益,并且基本上都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它们因此得以通过伦敦的私立学院给那些可能永远不会到自己本校的学生提供学位。从国家的角度上看,这种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出现正在增加英国可以给留学生提供的席位,因此会吸引更多的留学生。

报告也给英国新政府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其中一些建议涉及到清理目前混乱且不完备的监管制度;另一些建议则认为应该把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纳入政策讨论范围,它们应该提供其活动的全面信息。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仍有一些大的机遇和挑战。经费拮据的英国政府可能会非常想与私立学院签订协议,让它们以比政府付给公立高校低的费用来培养英国学生。美国其他的高等教育提供者也可能仿效阿波罗集团,进入英国市场。无论如何,为国内外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私立机构未来几年肯定会不断增加。

作者注:欲了解更详细的情况,请参阅英国大学联合会2010年3月发布的由John Fielden、Robin Middlehurst和Steve Woodfield完成的报告《英国私立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增长》, <http://www.universitiesuk.ac.uk/Publications/Pages/Privateandforprofitproviders.aspx>。

印度对外国高校的门户开放：远远不够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印度可能最终会对国外的高校和投资开放国门。内阁已经批准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比尔·西巴尔 (Kapil Sibal) 提议的法律, 并将在不久的议会上对该法律进行投票。印度的民意大部分是支持开放的。门户开放对印度的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 对那些有意在印度开办分校的外国高校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从根本上来讲, 门户开放的结果可能没有现在所想象的好, 实施的过程和结果都会存在问题。

政治和教育背景

人们公认印度的高等教育存在严重的问题。虽然印度的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三, 拥有 1,300 多万学生, 但是接受教育的学生只占适龄人口的约 12%, 远远低于中国的 27%, 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半左右。因此, 为印度不断增多的年轻人和迅速增加的中产阶级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是个很大的挑战。由于只有一小部分的高校可以达到国际标准, 因此印度还面临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印度的精英高校非常少, 除了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 就只有少数像塔塔基础研究院那样的专门性学校、伯拉科技学院 (Birl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等一两所私立高校以及大约 100 所最好的本科学院。在印度的 480 所公立大学和 25,000 多所本科学院中, 大部分最多达到国际的一般标准。印度给各种弱势群体保留高等教育入学名额的复杂法律制度, 通常给这些人群

保留一半的入学名额, 给高等教育系统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供给不足问题

印度的整个教育系统都面临着严重的供给不足问题, 部分原因是多年的投资不足。在印度独立了五十多年后, 仍有 1/3 以上的印度人是文盲。4 月 1 日, 一项将基础教育免费和义务化的新法律生效。虽然这条法律很好, 但是面临着缺乏受过培训的教师、预算不足、监管不良的问题。西巴尔部长一直在整顿印度的高等教育。原本分别负责监管大学和技术类院校的大学资助委员会和全印技术教育委员会 (All-India Council for Technical Education) 正在被废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联合实体。但是没有人知道新的机构会如何运作, 会有哪些员工。素以动作缓慢著称的印度高等教育认证和质量保证机构——国家评价和认证委员会 (National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Council) 也在被重组。但同样的, 也没有人知道它会被什么机构取代, 或者它会被如何改变。

印度目前的计划包括在印度各邦建立新的全国性世界一流大学、建立新的印度理工学院等。由于已知的资金不足和合格教师缺乏问题, 这些计划不可能成功。事实上, 公立高校教师的薪酬并不比印度不断增加的私立高校教师的薪酬有吸引力, 在国际上也没有竞争力。很多顶尖的印度教师, 现在都在美国、英国等地教学。甚至连埃塞俄比亚和

厄立特里亚都招聘了印度的教师。

供给不足将会影响印度新的门户开放政策。如果印度确实对外国高校开放国门，它将无法对其进行充分的监管和评估。

为什么欢迎外国高校？

对于允许外国高校进入印度市场，西巴部长好像有几个目标。他希望这些外国高校提高印度非常需要的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带来高等教育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研究方面的新观念；希望能带来投资；希望一流的外国高校为印度的高等教育系统增加声誉。所有这些预期都至少值得商榷。虽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外国分校为当地民众提供了更多的入学机会，但是它们并没有显著提高学生数量。在外国分校活跃的波斯湾国家、越南和马来西亚，学生的入学机会因此略有提高。几乎所有的分校规模都不大，所设专业也很有限，基本上都是那些办学成本较低、学生需求较大的专业，比如商学、技术和酒店管理等。很少有分校在学术创新方面做出贡献。它们通常采用经过检验且可靠的管理方法、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分校通常受其母校的严格控制，自主性很小。虽然它们能给印度带来一些有用的观点，但对它们的期望不可过高。

外国高校会给印度的高等教育带来一些投资，特别是因为新法律要求投资不低于1,100万美元（算是进入费），但是总的投资量不会太大。已有经验显示，出资的外国大学很少在其分校身上投入大量资金，最主要的投资往往来自分校所在的国家，比如富含石油的海湾国家。外国高校很可能是想在印度先“试试水”，看看它们的做法是否可持续下去，因此它们可能会限制最初的投资。

全世界的经验都表明，进入其他国家市

场的大部分高校都不是著名大学，而是追求市场准入和收益的较低端高校。新出现的营利性教育提供者对全球扩张尤其感兴趣。一流的大学可能会与印度的同类高校开展合作或建立研究中心，但是不太可能在印度独立建设分校。不过也有少数例外，比如佐治亚理工学院显然在考虑向海得拉巴市（Hyderabad）投入巨资。

总而言之，至少在近期或不久的将来，外国高校的做法都不太可能会实现印度政府的预期。

半门户开放

印度的门户开放有很多的条件和限制，将其称为“半门户开放”可能更合适。这些条件很可能会阻止许多外国高校进行投资。比如新法律要求投资不能低于1,100万美元，限制外国投资者从印度的分校中谋利。

目前尚不清楚印度政府是否会在允许外国高校设立分校或其他机构之前，对其进行评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谁来进行评估呢？目前尚不清楚的还有，外国高校的分校是否会遵守印度高度复杂且备受争议的预留制度。如果分校必须接受大量无力支付高额学费、往往需要昂贵的学业补习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那么分校的经济状况肯定难以稳定。

各邦政府在制定对外国分校的规范和条件中的作用，也可能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印度的教育由中央和邦政府共同负责，对于高等教育、特别是外国高校的参与，许多邦的做法和态度都不相同。南部的一些邦，例如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和卡纳塔卡邦（Karnataka）对分校很感兴趣；其他邦，例如有共产党政府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可能更持怀疑态度。少数邦，例如

恰蒂斯加尔邦 (Chattisgarh), 则将大学的地位卖给最高的出价人。

外国高校需要应对印度时常难以打交道、有时还腐败的官僚机构。例如, 近期有报道称, 已有证据表明由于申请者和政府高官之间的可疑行为, 一些印度高校被授予了梦寐以求的“被视为”大学的地位。目前尚不清楚外国分校是由印度政府机构评估, 还是完全由海外的质量和认证机构评估。

总之, 仅仅是外国高校怎样获得进入印度的许可、它们将如何被管理、谁将负责掌控如此复杂的关系网等问题,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可能的情景

印度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很显著。不论是处在高等教育系统最底层的高校, 还是最上层的精英高校, 都需要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

印度的高等教育系统需要系统而全面的改革。此外, 来自国外的新鲜血液可能有助于刺激当地人的思想。然而, 外国高校不可能解决印度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 甚至是不可能改善这个系统。

一旦外国高校意识到在印度面临的挑战, 它们就可能不会采用太大的动作。其中一些高校可能会希望先尝试一下, 看看具体情况。而其他许多高校则会因为印度当局的条件限制和地方情况的不定性, 而踌躇不前。

外国高校参与印度高等教育一事, 可能就与西巴尔部长新政实行之前一一样的情况不明。

作者注: 本文也发表在《高等教育纪事》上。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

William Saint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高等教育方面的独立顾问

电子邮箱: wsaint@cox.net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对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研究很少。49个国家里,一半的国家要么根本没有法律制度,要么是使用二十几年前制定的法律制度。鉴于此,本文分析并比较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4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立法和公立大学的规章制度。

高等教育系统的治理

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高等教育的扩张,很多政府都建立了中介或“缓冲”机构来监管日渐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在英语国家里,这种委员会更加常见。在法语国家里,通常设立独立的高等教育部门。目前,42个国家中有15个建立了半自治的缓冲机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数量在7~28人之间,平均为16人。成员的构成通常是公立大学、学术团体和私立大学之间平衡的结果。

在大部分国家里,委员会成员的任命直接由国家元首、首相或教育部长进行。其他的国家则采取混合程序,即一部分成员由国家任命,另一部分成员则由法定的利益相关群体民主选举产生。

大学的治理

大学也采取类似的治理机构。通常,治理委员会负责确立学校的战略方向、批准内部的规章制度、接受国家财政拨款、说明资金如何使用、管理学校的资产、维护学校的利益。第一种模式以说法语和葡萄牙语的大学为代表,委员会成员全部或大部分由学校

的教职工和学生代表组成。委员会由学校最高领导负责,具有相当的自治权,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很少。这种模式赋予了校最高领导相当大的权力。第二种模式经常出现在说英语的大学里,委员会包括各种外部成员。其中最常见的是政府代表,其次是来自私立部门的代表。

治理委员会

大学治理委员会的成员数量,最少的是11个人,最多的是40人以上。大学治理委员会最近也根据委员会规模减少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人数增加的国际趋势,进行了改革。通过委员会成员的任命程序,可以让我们了解法律制度对政治上向谁尽责(或政治控制)的规定。在法语和葡萄牙语的国家里,有一个限定委员会成员的内部准则。委员会成员通常是学校教职工,他们因为在大学里的职位而进入委员会。在一些英语国家里,委员会成员通常由国家元首或教育部长任命。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的部分席位通常被指定给大学的高级人员。在其他八个国家里,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是根据“代表利益相关者的准则”。

学校领导

在多数非洲国家里,学校最高领导(即校长)这个职位,是一个备受瞩目、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职业。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要明确向谁尽责,22个国家里有9个国家的

大学校长由国家元首任命。在4个国家里，大学治理委员会有权自行选择校长，不用得到政府的同意。政府对大学其他的高层领导职位的管理没有那么严格，22个国家里有10个国家的治理委员会有权进行选择。18个国家里有8个国家，大学的院长和主任由学术同行选举，因此这些职位在大学里的选举最为民主。在系主任遴选方面，很少进行选举，通常是校长进行选择。

学术治理

学术事务通常由受治理委员会管理的学术委员会负责，主要是制定有关课程体系、教学质量、招生、考试、学位授予和研究等方面的学校政策。学术委员会通常给治理委员会提出教师招聘、晋升和新的学术单位建立等方面的建议。有时也对学术活动进行初步预算。学术委员会一般有50（多个）成员，通常由校长领导。

经济自主权

可以从多方面获得运营收入的自由，加强了高校的决策自主权。非洲的大部分大学都被允许从政府、捐赠、创收活动和学费中获取资金。允许大学收取学费的法律条款非常普遍，21个国家中有17个采取这种做法，虽然这种权力实际上可能被政治压力削弱。大学是否可以聘用或解雇教职工，也是经济自主的一个衡量标准。在葡萄牙语国家里，校长被赋予了这种权力。在英语国家里，治理委员会通常被赋予决定权。在法语国家里，这种权力被赋予校长或部长。总之，英语国家的大学好像比法语和葡萄牙语国家的大学享有略多的经济自主权。

问责

问责必须和自治同时存在。当政府把决策权让渡给大学时，政府面临的挑战是确保大学对政府负责，遵守颁布的政策，合理使用经费。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律制度通常有五大机制来确保高校负责：战略规划、利益相关者代表参与治理、质量和经济审计、年度报告和按业绩拨款。

大学通过让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参加治理委员会，来实现向利益相关者负责。近年来，来自校外团体的委员会成员的数量有所增加，是特定利益群体选出的代表。例如，坦桑尼亚最新的法律规定，委员会要有75%的校外成员，而莱索托（Lesotho）和南非的规定是60%。在法语国家里，塞内加尔的捷斯大学（Université de Thiès）和卢旺达的基加利理工学院（Kigali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都要求委员会有35%的校外成员。

结束语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在发展进步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过去二十年里，大约一半的国家开展了有效的改革，例如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等，而其他的国家则没有。改革普遍提高了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质量保证，扩大了私立高等教育的规模。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成本效益、经费来源多样化等问题的关注较少。少数国家对法律制度进行了大量改革，达到或超过国际上的最佳做法，比如南非、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在其他一些国家里，比如博兹瓦纳、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和马里，改革也很显著，但是没有那么大胆。

不论是在高等教育改革措施的数量还是目标方面，法语国家尤其滞后于非洲其他国家。虽然法语国家和英语国家的法律体系和

大学传统存在明显差异，但是英语国家最近在高等教育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应该为那些希望革新和现代化的法语国家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示范。为了促进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对比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当地的大学应该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相关的高等教育法案、大学规章制度法令等。

作者注：本文讨论的一些主题见作者发表在《高等教育政策》(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009年第22卷(第4期)上的文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高等教育治理的法律制度》。

蒙古的挑战：高等教育的亚洲化

Gerard Postiglione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管理与社会科学系系主任、教授

电子邮箱: gerry@hku.hk

虽然出现了全球经济危机，但蒙古共和国决心继续重构其高等教育系统。并不广为人知的是，蒙古在教育指标方面的表现，可以与其近邻（中国、韩国和日本）相匹敌：其人民普遍受过教育，基础教育已经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80%。当蒙古1990年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后，国内的私立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目前在校生数占总数的1/3。多数高校都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40%的首都乌兰巴托。其余地区的人也受过教育，过着游牧生活。英语已经取代俄语，成为这个有280万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的第二官方语言。蒙古的历史环境让它成为东亚最欧化的国家。但是，蒙古人民保留了亚洲人尽可能接受教育的价值观。

解决复杂的问题

蒙古的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9.0%，在全球排名第七，其教育法确保至少20%的政府预算要用于教育。不过，高等教育只得到其中12%的经费。对于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做法也有道理。但是，重新思考蒙古高等教育体制及其拨款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国立大学能得到政府的取暖和照明经费，但其他的经费很少。一位大学领导指出，80%的教师工资来自学费。国家资助每个公务员家庭的一个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为来自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也提供支持。然而也有人提出，高等教育贫困的一个根源，因为郊区牧民家庭67%的个人贷款都是用于

孩子接受高等教育。

由于公民有文化、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入学率高和保留至今的亚洲教育观，蒙古共和国好像有良好的条件继续推进高等教育重构，把教学和研究提高到国际认可的水平。不过，也存在一些严峻的挑战。

迫在眉睫的挑战

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蒙古政府的高等教育支出十分有限。例如，马来西亚和香港的生均开支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亚洲多数国家。蒙古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包括在高等教育中开始收费。然而，与日本、韩国、中国不同的是，蒙古政府无法对其国内最好的大学进行同样的经费投入。经费投入确实非常重要。香港将其30%的教育经费用于高等教育，是整个亚洲在同一个城市中拥有最多一流大学的地区。虽然一些亚洲国家向高等教育的投入少于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如果只有12%的教育经费被用于高等教育，那么就无法实现高等教育的高水平。

蒙古私立高等教育的质量尚未超过公立。私立高校的历史虽短，但是它们正在奋起直追，一些高校的教育水平可以与公立高校的竞争。有人认为，由于国立高校仅从政府得很少的经费，它们实际上是名为国立高校，却事实上按私立模式办学。但是私立高校认为自己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经费，目前的学生规模之比应该颠倒过来，即国立高校招收1/3的学生，私立高校招收剩下的学生。

在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私立高校招收大部分的学生，有的高达80%。蒙古私立高校的学生规模仅占学生总数的34%，私立高校认为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

由于高校太多，达到了162所，因此每所高校的平均规模是900名学生，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其他国家和地区用并校的做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高校的平均学生规模是3,112人；而在1990年，这个数据是1,919人，大约80%高校的学生规模低于4,000人，60%高校低于3,000人。到2000年，612所高校合并为250所，有些中国大学现在的学生规模超过50,000人。其他国家也在应对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在私有化的最初阶段，小规模的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很少能提供高水平的教育。私有化经过最初的阶段后，需要一个质量保证体系，通常就会有更多高校会被关闭和合并。

蒙古主要的大学只得到很少的教师为学生提供教育，师生比约为1:23。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流大学里，师生比要低一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师生比是1:10.5，纽约大学是1:11.5。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学院的师生比是1:13。在QS最新的世界顶尖大学排名中，生师比所占的比重为20%。虽然师生比并不直接代表教学和研究质量，但是关系密切，蒙古需要考虑招收杰出的教师。

与东北部的亚洲邻国日本、韩国和中国一样，蒙古渴望拥有国际认可的研究型大学。要想建设一所被高度认可的研究型大学，需

要政府投入相应的财政经费，毫不吝啬地为研发活动投入资金。一些研究者仍然认为，直接在研发投入与科研生产力之间建立联系是危险的。香港的研发经费只占GDP的0.7%，但科研论文的人均产出却很高。但是无论如何，蒙古的研发经费仅占GDP的0.28%，在全球排名第70位。香港排第50名。因此，蒙古应该向研究型大学投入更多的研发经费。

蒙古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来留住一流的高校教师。工资低是提高教师质量的一个障碍。在蒙古，教师为了挣更多的钱而下海的情况非常普遍。目前，需要在其他地方工作来补充自己收入的兼职教师，在公立高校占18%，在私立高校占44%。争取最好的教师应该是首要任务，但是经济现状极大地限制了高校吸引并留住那些能明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竞争力的人才的能力。

前景更光明，还是与以前差不多？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世界上最大矿藏（煤、铜和铀）之一的发现，使得蒙古经济的前景一片光明，但是蒙古目前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难以承受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很多毕业生正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求职。如果蒙古无法尽快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上述挑战，那么蒙古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利用已有的机会。

庆祝洪堡大学建校200年周年

Sebastian Litta

曾就读于柏林自由大学，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麦克洛伊学者（McCloy Scholar）
电子邮箱：sebastian_litta@hks10.harvard.edu

1810年10月15日，一所新的大学在柏林诞生了。这所大学在建立之初很普通，只有256名学生和53名教授，但是它却最终塑造了德国，乃至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图景。柏林大学，随后改名为洪堡大学，彻底改革了大学的理念。如果没有效仿洪堡大学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创新，那么哈佛大学可能就不是现如今的样子了。洪堡大学的这项进步，也是美国众多研究型大学的要素之一。虽然洪堡大学现在亟需改革，但它在过去的200年里，一直是德国高等教育的关键组成。德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最初曾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系统，但该系统后来变成一个既僵化又官僚化的庞然大物，直到最近才开始进行改革。

改革普鲁士的教育系统

新建立的洪堡大学是革命性的，因为欧洲的大学以前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它们更多是发挥知识储藏、教学和考试的功能。在18世纪，很多大学实际上远远脱离学术界之外快速发展的社会和科学变革。就如同躲在修道院厚墙和藩篱之后的修道士一样，它们被外界遗忘甚至轻视。

德国的一些地区采取了措施来结束这种学术惨状，例如建立哥廷根大学和哈勒（Halle）大学这样的新大学。哈勒大学最终成为普鲁士最重要的大学，但是它在1806年被拿破仑关闭，因为拿破仑认为多数大学都毫无价值。在失去了最重要的大学之后，普鲁士的改革者开始思考建立一所新的高校。

1809年，威廉·冯·洪堡（国家派往梵蒂冈的特使）开始负责改革普鲁士的教育系统。虽然他仅在位一年，但却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洪堡推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建立了师范教育的标准，还成为柏林大学建立的推动力。

从中世纪的大学到现代的研究型大学

1802年，拿破仑废除了他的国家大学，取而代之的是高等专科学校。洪堡采取了不同的道路，他希望对大学的使命进行创新，从单纯地保存知识变成真正地生产科学知识。研究19世纪德国历史的弗莱堡大学历史教授西维娅·派莱兹恰克（Sylvia Paletschek）指出，洪堡有关大学的理念并非完全是新创的，而是综合了德国其他大学的改革观点。此外，这所新大学最初并不是明确定位于研究型大学。但是，国家不断的大量投入和国家需要，促使洪堡大学在之后几十年里建立了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19世纪末，美国大学采取这种研究和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创立了研究生院或完全的研究生教育机构，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克拉克大学。哈佛大学对此起初持怀疑态度，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开始采用这种模式。

洪堡大学现在的情况

虽然洪堡大学曾经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一个典范，吸引了诸如黑格尔、叔本华、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伟大的思想家，在20世纪

前30年里共产生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随后它却失去了吸引力。

20世纪30年代初期，当笔者的祖父从德国西南部的蒂宾根大学（Tübingen University）转到柏林追随年轻的神学教授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学习后，他亲眼目睹了洪堡大学的毁灭。1933年，犹太作家和教授的著作在图书馆前被激动的学生焚烧。犹太教授遭到驱逐，学校失去了很多最有创新精神的最优秀教授。纳粹统治结束后，洪堡大学在前苏联控制的东柏林重建。1947年，一部分学生和教授因为思想不符合共产主义思想，再次遭到驱逐。在西柏林市长（以及福特基金会，据说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12名持自由思想的学生和教授在美国控制的西柏林重新建立了洪堡大学，并将其称为自由大学，作为共产主义洪堡大学的对立面。自由大学后来成为德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当柏林墙被推倒之时，没有人知道柏林这两所主要的大学命运将如何。刚开始的时候，好像现在洪堡大学会重新获得以前的实力：经费大量涌入，优秀的教授被雇佣。自由大学则因为过于拥挤和平庸，前景渺茫。

洪堡大学与德国大学的没落

洪堡大学无法恢复其二战前所拥有的国际学术中心地位。它就像当代德国大部分大

学一样，面临着各种难题：经费来源严重匮乏；没有明确的大学使命和有效的治理架构；生师比严重失调；校内建筑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未得到修缮；终身教授和“底层教师”（包括兼职教授、副教授和副教授）之间等级森严；以及一些最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移民到美国的大学。

2007年，德国为“卓越计划”遴选出的9所大学提供联邦经费，建立了人工的常春藤盟校。在竞争中绝对处于领先地位的洪堡大学十分震惊，因为它不但没有被选上，而且自由大学在9所大学之列。洪堡大学的落败可能是由于缺乏明确的研究型大学特点，不过其校长在竞争中途离任也无益于学校获胜。继任的校长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能够为学校建立新的自信。

2010年：新的开始

2010年，新的校长扬·亨德里克·欧尔伯特（Jan-Hendrik Olbertz）将走马上任。这位新校长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曾在哈勒大学担任教授，是德国最受尊敬的州文教部长之一。这是一个异常大胆和有趣的选择。他的上任可能会给洪堡大学重拾昔日风采带来很大的机会，使得洪堡大学通过自我改造，再次成为高等教育的典范。

新书简介

Bhandari, Rajika, ed. *International India: A Turning Point in Educational Exchange with the U.S.*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0. 141 pp. \$39.99 (pb). Web site: www.iiebooks.org. ISBN 978-0-87206-321-1.

该书讨论了美国和印度高等教育的关系, 关注两国的相关政策和项目。讨论的主题包括移民企业家的作用、印度有关美印交流的政策、印度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跨文化能力, 以及美印大学合作的一些案例。

Clark, John B., W. Bruce Leslie, and Kenneth P. O'Brien, eds. *SUNY at Sixty: The Promise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lbany, NY: SUNY Press, 2010. 365 pp. (pb). ISBN 978-1-4384-3302-8. Web site: www.sunypress.edu.

纽约州立大学是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系统, 共有64个校区和44万名学生。同时, 它也是最新的大学系统之一。该书是纽约州立大学60周年纪念册, 书中的文章涉及学校的历史、校园间的差异、学校的全球策略、大型学术系统中的多样性等主题, 对纽约州立大学系统及其校园的历史和演变给予了极大关注。

Cole, Jonathan R. *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 Its Rise to Preeminence, Its Indispensable National Role, and Why It Must*

Be Protecte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0. 750 pp. \$35 (hb). Web site: www.publicaffairsbooks.com. ISBN 978-1-58648408-8.

该书的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前教务长, 他在书中对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 讨论了美国大学的历史和目前的危机。作者强烈认为, 美国的大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贡献了塑造美国经济的大部分知识和创新。书中还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具体的科学发现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

Garland, James C. *Saving Alma Mater: A Rescue Plan for America's Public Universitie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2009. 268 pp. \$27.50 (hb). ISBN 978-0-226-28386-9. Web site: www.press.uchicago.edu.

作为前大学校长和教授, 该书的作者加兰(Garland)认为, 应该对美国公立大学的管理和拨款方式进行彻底变革。他提倡大学更加关注有效管理和治理, 并建议州政府给予学校更多的自治。他最激进的建议是, 各州不再对公立大学进行直接拨款, 大学应该自己负责经费筹措。该书完成于经济危机之前, 但目前可能更有价值。

Gaston, Paul L. *The Challenge of Bologna: What United States Higher Education Has to Learn From Europe, and Why It Matters That*

We Learn It. Sterling, VA: Stylus Publishing, 2010. 225 pp. \$35 (hb). ISBN 978-1-57922-366-3.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

该书讨论了欧盟博洛尼亚进程对美国的意义,介绍了欧洲在加强高等教育协调与流动性方面所采取的方式,包括博洛尼亚进程的历时演变。作者强调,美国高等教育应该理解并参与欧洲持续的国际化行动。

Gerth, Donald R. *The People's University: A History of the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Berkeley, CA: Berkeley Public Policy Press,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0. 664 pp. (pb). ISBN 978-0-87772-435-3.

加州州立大学共有23个校区,45万多名学生,是美国最重要、最著名的公立大学系统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加州大学的强烈影响,但是对加州人民来说更加重要。这部由加州州立大学已退休校长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撰写的史书,全面讨论了该系统长期以来的主要发展。

Gross, John G., and Edie N. Goldenberg. *Off-Track Profs: Nontenured Teachers in Higher Educ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192 pp. \$30 (hb). ISBN 978-0-262-01291-1. Web site: www.mitpress.mit.edu.

目前,非终身教职教师占美国高等教育新聘教师的一半以上。该书聚焦于这个越来越重要的群体,即那些不能获得终身雇佣的非终身教职系列的教师,包括全职的合同制教师、兼职教师等。书中重点分析了少数著

名研究型大学的情况,讨论了教师聘用条例的制定、聘用中的市场力量、非终身教职教师的作用等。

Hoffa, William W., and Stephen C. DePaul, eds. *A History of U.S. Study Abroad: 1965–Present.* Carlisle, PA: Frontiers Journal, 2010. 510 pp. Web site: www.frontiersjournal.com.

该书讨论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出国留学政策和实践,涉及出国留学的经济问题分析、技术与出国留学、目的地的不断多样化、出国留学与课程、出国留学机构的专业化等。

Menand, Louis.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New York: Norton, 2010. 174 pp. \$24.95 (hb). ISBN 978-0-393-06275-5.

该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涉及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若干核心主题:通识教育的问题与人文学科的“危机”、跨学科、高校教师的政见等。该书的作者曼南德(Menand)是哈佛大学的英语教授、杰出的“公众知识分子”,他的这本书非常引人入胜。

Musselin, Christine. *The Market for Academ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63 pp. (hb). ISBN 978-0-415-99683-9.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该书详细分析了法国、德国和美国这三

个国家中的高校教师聘用和学术劳动力市场,不仅提供了这些国家的丰富信息,也提供了对教师职业生涯的比较研究。这项原创性研究以访谈等为基础,是对高校教师职业生涯和市场的比较研究。

Obst, Daniel, and Matthias Kuder, eds. *Joint and Double Degree Programs: An Emerging Model for Transatlantic Exchange*.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9. 168 pp. \$39.95 (pb) ISBN 978-0-87206-318-1. Web site: www.iiebooks.org.

该书以纽约国际教育学院和柏林自由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为基础,讨论了跨大西洋的联合及双学位培养项目,涉及课程设计、联合培养项目中的交流问题、选择双学位的动机、经费问题、学生遴选、可持续性等。该书的一个重点是指导实践。

Palfreyman, David, and Ted Tapper, eds. *Structuring Mass Higher Education: The Role of Elite Institu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43 pp. (hb). ISBN 978-0-415-42604-9.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该书的基本观点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给学术系统的所有层面都带来了挑战,精英大学必须适应全球性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面对挑战,不同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该书提供了有关高等教育系统结构调整和精英高校的案例,涉及波兰、德国、英国、印度、中国、法国等国家的情况,以及美国的常春藤盟校、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Richardson, Richard, Jr., and Mario Martinez.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n Examination of Cases Across State System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09. 263 pp. (hb). ISBN 978-0-8018-9161-8.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该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理解高等教育政策对高校表现的影响,认真讨论了美国新墨西哥州、加州、南达科塔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不同的高等教育政策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包括治理者、立法机关、行政机构等。各州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解决高等教育的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成功度也不同。

Salazar-Clemeña, Rose Marie, and V. Lynn Meek, eds. *Competition, Collaboration and Change in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Manila, Philippines: De La Salle Univ. Press, 2008. 211 pp. (hb). ISBN 978-971-93801-2-2. Address: De La Salle Univ. Press, 28-C Scout Albano St., Quezon City 1103, Philippines.

该书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研究与知识论坛”(UNESCO Forum o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Knowledge)的资助,对亚洲学术职业的变化进行了研究,涉及马来西亚、印度、伊朗、南太平洋、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家。此外,书中还对比了不同的拨款和管理方式。

Schuman, Samuel. *Seeing the Light: Religious College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10. 326 pp. (hb). ISBN 978-0-8018-9372-8.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该书的研究重点是美国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学院, 尤其是它们在不断变化的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宗教认同。对大约 12 个教会学院的案例分析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此外还有从宗教角度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讨论, 以及这些案例的启示。为了进行比较, 书中有一个章节讨论了 3 所罗马天主教院校的情况。

Shavelson, Richard J. *Measuring College Learning Responsibility: Accountability in a New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2010. 238 pp. (pb). ISBN 978-0-8047-6121-5. Web site: www.sup.org.

该书讨论了两个既有相关性但又相对独立的问题: 高等教育的学生学习评价与问责, 包括质量保证。作者主要研究了美国的情况, 但是也有一章讨论国际框架下的质量保证。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手段, 例如大学学习评价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 在书中也被讨论。

Smart, John, 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24.*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9. 475 pp. €181. (hb). ISBN 978-1-4020-9627-3.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该书包括一系列主要分析美国高等教育诸多相关问题的文章, 讨论的主题包括基于需求的学生补助、定性研究、经济援助对院校的成功是否重要、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拉美后裔等。

Smelser, Neil J. *Reflections o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rom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to the Global University.*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380 pp. \$45 (hb). ISBN 978-0-520-26096-2. Web site: www.ucpress.edu.

社会学家斯梅尔瑟 (Smelser) 对美国高等教育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密切观察。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和加州大学的领导, 他将自己分析加州大学关键问题的文章汇集成册并出版。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伯克利的危机、平权行动、加州大学的治理等。

Smith, Darryl G. *Diversity's Promise for Higher Education: Making It Work.*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09. 331 pp. \$50 (hb). ISBN 978-0-8018-9316-2.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的热门话题之一, 多样性主要是确保不同性别、种族、社会阶层和宗教团体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并在学术界得到适当的地位。本书讨论了四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重点讨论促进美国教师和学生多样性的观点。

Stromquist, Nelly, ed. *La Profesión Académica en la Globalización: Seis Países, Seis Experiencias*. Mexico City, Mexico: ANUIES, 2009. 319 pp. (pb). ISBN 978-607-451-008-9. Address: ANUIES, Tenayuca 200, Col. Santa Cruz Atoyac, México DF, Mexico.

该书是2007年第一次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教授》(The Professoriat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的西班牙语译本。该书根据6名受到富布莱特新世纪学者项目资助的学者的研究,对国家和高校中教授所面临的变化进行了案例分析。虽然各国的情况存在差异,但国家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减少的趋势、私立高校的增加、研究的市场推广以及对大学声望的追求,都正在影响大学教授的职业认同和工作环境。

Trilokekar, Roopa Desai, Glen A. Jones, and Adrian Shubert, eds. *Canada's Universities Go Global*. Toronto: James Lorimer, 2009. 424 pp. C\$29.95 (pb). ISBN 978-1-55277-04102. Web site: www.lorimer.ca.

该书全面展现了加拿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各种方面,讨论的主题包括魁北克省的国际化政策、曼尼托巴省(Manitoba)和阿尔伯达省的措施、大学课堂的问题、世界公民与世界卫生、教师的国际化、跨境策略等。其中有两篇文章讨论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国际经验。

Trow, Martin. *Twentieth-Century Higher Education: Elite to Mass to Universal*.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10. 627 pp. \$40 (pb). ISBN 978-0-8018-9442-8.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马丁·特罗是20世纪后期最杰出的高等教育社会学家之一。该书收录了他的许多美国和国际高等教育方面的重要文章。其中包括非常有影响的论述精英型—大众型—普及型入学模式的文章,以及英国高等教育、美国大学的内部运营、美国的治理和改革、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转型中的问题等方面的文章。

Tuchman, Gaye. *Wannabe U: Inside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256 pp. \$25 (hb). ISBN 978-0-226-81529-9. Web site: www.press.uchicago.edu.

该书对一所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后起之秀”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案例分析,关注该大学如何加强管理,以提高学校的排名名次。作为对学术组织公司化的研究,书中讨论了问责、规划过程、管理人员权力增加等相关主题。

Varghese, N. V., ed.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in Asia*. Pari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2009. 201 pp. (pb). ISBN 978-92-803-1335-2. Web site: www.iiep.unesco.org.

该书聚焦于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高校重组,包括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和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泰国和越南的案例分析。书中对各国的变化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供了相关的统计信息。

Verger, Antoni. *WTO/GATS and the Global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48 pp. \$95 (hb). ISBN 978-0-415-99882-6.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该书详细研究了有关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以及到2009年为止的情况,不仅对《服务贸易总协定》做了描述,而且分析了几个谈判的案例。书中有关阿根廷和智利的案例,为理论分析提供了实践的细节。

Wildavsky, Ben. *The Great Brain Race: How Global Universities are Reshaping the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2010. 239 pp. \$26.95 (hb). ISBN 978-0-691-14689-8. Web site: www.press.princeton.edu.

记者本·维尔代夫斯基(Ben Wildavsky)在书中从美国的视角出发,对全球高等教育的趋势进行了乐观的探讨,包括的主题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分校问题、排名及其影响、营利性高等教育的作用。该书根据对关键人物的访谈撰写,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Winkle-Wagner, Rachelle. *The Unchosen Me: Race, Gender, and Identity among Black*

***Women in Colleg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09. 227 pp. \$55 (hb). ISBN 978-0-8018-9354-4.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该书分析了非洲裔美国女大学生的自我身份认同形成问题,展示了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如何在大学里排除困难、形成自我的身份认同,为在高等教育研究认同、种族和性别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

Woźnicki, Jerzy. *The University as an Institute of Public Domain: The Polish Perspective*. Bucharest, Romania: UNESCO-CEPES, 2009. 443 pp. (hb). ISBN 978-92-9069-191-4.

该书讨论了大学在波兰社会中的作用,首先分析了作为重要的知识创造机构的大学,其次讨论了波兰高等教育的法律和立法背景。

Yunus, Aida Suraya, Rosni Bakar, and Shukran Abdul Rahman, eds. *Student Loan Schemes: Experiences of New Zealand, Australia, India, and Thailand, and a Way Forward for Malaysia*. Pulau Penang, Malaysia: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2009. 168 pp (pb). ISBN 978-983-861-429-0. Web site: www.penerbit.usm.my.

该书从比较的角度出发,对若干个国家的学生贷款计划进行了对比分析,其中包括澳大利亚著名贷款计划的设计者布鲁斯·查普曼(Bruce Chapman)所写的一篇文章。在

该书的最后两章中，作者研究了马来西亚在学生贷款方面的理念。

Zemsky, Robert. *Making Reform Work: The Case for Transforming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2009. 240 pp. \$25.95 (hb). ISBN 978-0-8135-4591-2. Web site: www.rutgerspress.rutgers.edu.

该书的作者罗伯特·泽曼斯基 (Robert Zemsky) 是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高等教育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在书中批评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并提出了改革建议。他分析了目前的问题，指出技术并没有对高等教育产生广泛的影响。他认为高等教育应该适应市场和不同群体，同时关注核心价值，并注意教学质量、问责以及相关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Vol. 3, No. 3, August, 2010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60, Summer 2010,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Issues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85

Faculty Perceptions of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87

Focus on China

Quality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90

Expans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92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China.....94

Peking University's Personnel Reforms.....96

China's Polytechnic Transformation.....98

British Perspectives

Elite Inclusiveness: The Case of Oxford.....100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K.....102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dia's Open Door.....104

Legal Frameworks in Sub-Saharan Africa.....107

Mongolia's Challenge.....110

Humboldt's Two Centuries—and Today.....112

New Publications.....114